

再读阿城：跨越十年的感动

◎ 顾文豪

一套齐整的白色封面的新版《阿城文集》(作家出版社出版)就在我手边。而在不远处的书橱里，正是我多年收集的各种版本的阿城作品。现在，它们相遇了。新版文集最引人瞩目的部分即是几乎收录了所有至今能寻觅到的阿城文字——从杂文、序言到随笔、访谈——这些文字所涉及的话题与主题又是如此驳杂丰富——文学的、电影的、艺术的、历史的、文化的——即便早已读过这些文字中的绝大多数，但我仍然为它们所深深吸引。也就是说，吸引我的不再只是故事、情节和一切表面的设计，这种吸引力更多地来自阿城的历史意识、洞察力以及他不可仿效的叙述风度。

借用黑塞的说法，某种意义上，阿城也正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缝隙中的人。他出生于一个时代的转捩点，一个传统的余晖时刻，而他的成长则是目送传统的全面更迭以及维持这种传统的具体生活方式的破碎与消亡。但非凡的父辈们所给予的历史启蒙，已经悄然植入阿城的思维程序中了，与此同时，时代人世的巨变则以另一种更现实也更残酷的方式，无形中促迫他以自己的眼光去消化现实，融治历史。

因此，在我眼里，“三王”与“遍地风流”系列从来不止于一次所谓“寻根”的尝试，在更大的意义上，这些精简的小说其实是一部“史记”，是对一个黯黑的历史时刻的记录，是对一段野史无文的生活状况的记录，也是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个人命运被播弄的无数不幸事件的记录。我们生活在两种历史观里，几乎等同于生活在两种历史时间里。一种是课本上的、由上及下的标明确切时间、地点与事件的历史观，还有一种是潜藏在个人记忆



中、从未标注明确的历史记忆。我无意对这两种历史观作出价值判断，我只知道，它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几乎不可能同时出现，但当我读到阿城的作品——不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我立即确信两种历史观，两种对于我们过往生活的探索方式最终相遇了。

毫不回避现实中的残酷事件，直击荒败无根的文化虚空，描述一个那时从未被好好描述过的历史处境，借用奈保尔的说法，这些都“需要非同寻常的知识和同情心”。更重要的是，对黯黑的历史记忆的深入，并没有使阿城的作品沾染上同样黯黑的色彩与声调，恰恰相反，即便在最匪夷所思、动人心魄的叙述时刻，阿城的小说仍会升腾起一种暖意与喜剧性的声调。是的，我眼里的阿城是一位杰出的喜剧作家，他有自己的声音，而在这背后，是他那躲在圆框眼镜之后的柔情目光与写作时的悲悯之心。

写作不仅是编故事，也是对于知识的一种整合。小说也不全是无垠的幻想，——抱歉，又要借用奈保尔的观点——小说其实“来自对虚构的部分抛弃”，是透过虚构重新观察现实。因此，一部虚构作品，

既依赖创作者个人的天赋与能力，同时也与他身处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完整性息息相关。小说是对周围处境最直接的接触，而非虚构写作则是对历史潮流的深入探索，是对造成当下现实的各种历史力量的一次质疑与研究。本质上，虚构与非虚构写作并不矛盾，相反，它们互为支撑和补充——任何一种对于现实与过去的了解方式都是有限的。

观念需要包裹上人与叙事才有魅力，同样，故事也需要观念的支撑来获得持久的力量。因此，如果说阿城的小说给予我们别样的阅读快感，那么在他的创作中更占分量的非虚构写作，则是关于思考与洞察之魅的最佳示范。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讨久负盛名的《威尼斯日记》、《闲话闲说》、《常识与通识》以及新版文集中的《脱腔》、《文化不是味精》，但我相信造成这些作品无与伦比的吸引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则在于阿城独特的观察历史与现实的方式。

阿城的小说里有人，有风景，但转换到非虚构写作，他必须以另一种形式去驱动主题：惊人的阅读量与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相结合，

最终形成一种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现实的精神性描摹。

这种描摹立足于对中国人世俗生活的把握，以此为主线，阿城闲话中国，闲说历史。虽然阿城的叙述向来举重若轻，镇定自若，但明眼人都知道世俗生活与民间自为空间的渐次失落将导致积重难返的危机。就文化景观而言，失去活泼泼的传统，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将失去整合与适应时代的能力；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我们一方面深感不安，竭力模仿，另一方面却从来不曾真正接纳过现代事物背后的现代性价值观；表面上文化在延续，在繁荣，实际却并不完整，整个创造性与智识都陷入危机。

同样的，每一种文学模式都有与其相配合的社会知识。当阿城将世俗精神与中国小说互为勾连，他所做的不仅是阐释两者间的关联，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观察方式，揭示出一则习焉不察的真理——失去了特定的生活语境也就意味着破坏了文化的自足与完整，而那些原本诞生其中的虚构作品将一如宇宙中四处漂流的星辰，悬浮在虚无中，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阿城的语言准确、劲健、有诗意，它们源于对生活的细密观察，更源于对生活和他人的真切感情，一个个字词就像一个精灵，在合适的位置，它们召唤出真诚的魔力，释放出语言的快乐。而我，有幸在那时感受到这种魔力和快乐。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一家家让我寻获阿城著作的小书店，全都毫不起眼，甚至有点破败，其中一家的主营业务甚至不是卖书，而是卖鞋。但我怀念这些偶遇——在你始料未及的地方给你惊喜。一如多年来阅读阿城的经历，每每翻读那些不知读过多少遍的篇章，他却仍能不断给我以惊喜和感动。

新书推荐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美国)安东尼·多尔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法国少女玛丽洛尔生活在巴黎，幼年失明后，父亲保护她、训练她，鼓励她勇敢生活下去。1940年，德国入侵，她被迫离家，不久又与父亲骨肉分离，以瘦削的肩膀抵抗纳粹暴政。德国少年维尔纳从小失去双亲，与妹妹在矿区孤儿院相依为命。一心想摆脱底层命运的他，凭借无线电天赋跻身纳粹精英学校，本以为是命运的转折，不料却跌入另一个地狱。战争碾碎了他们的希望，两个陌生人的生命轨迹也意外交会。当平静的生活成为不可企及的黑暗之光，他们是否有勇气，在死之前，活出生机？小说耗时十年完成，一出版即占据纽约时报和美国亚马逊畅销榜，迄今已65周之久；在2015年获得普利策奖(虚构类)。作家J·R·莫林格评价多尔“用科学家般的眼睛观察，却如诗人般感受这个世界。”

《去年天气旧亭台》叶广岑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去年天气旧亭台》由《太阳宫》《月亮门》《鬼子坟》等九篇描写北京百姓人家日常生活故事组成，每个篇名都是一座北京建筑的名字。这些作家自幼生长，耳熟能详的地方在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中或已灰飞烟灭，或已面目全非。几十年离别故乡的生活经历，使得叶广岑饱蘸浓情之笔，记录下老北京的历史、风俗、人情，留给现代化的北京及当代北京人最珍贵的记忆。小说集触动作家最真切“童年”与“乡愁”之体验，构思精巧，意味隽永。叶广岑说，“不能忘记胡同给予我文字中的爱和敬意、尊严和高尚，我从中看到了这座城市内里的厚重和达观。这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是我非常宝贵的积淀。”

《抓住时机》索尔·贝娄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抓住时机》是索尔·贝娄直面犹太人父亲的小说。作品描述了威尔姆·阿德勒失败又疯狂的一天。作家在这部小说里影射了他和保守的父亲的关系：威尔姆是一个失业、身无分文的末流演员，刚和妻子分居(但对方为了经济问题又拒绝离婚)，绝望之中他向德高望重的医生父亲阿德勒医生求助。在百老汇附近的酒店里，犹太人父亲用实用主义的冷漠批判了威尔姆的逃避、空虚和缺乏远见，并拒绝他的资助请求——而在百老汇附近的期货交易所里，神神叨叨的伪哲学家、真骗子塔木金正把威尔姆最后的一点积蓄投入荒唐的交易，并逃之夭夭。在喋喋不休、梦呓般的自我清算中，威尔姆冲进一场葬礼，用泪水化解了“自我的负担”。

《荒漠的旅程》彭小莲、刘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此书采用双线叙事，记叙了作家刘溪家庭，和其妻子吴进的上代家庭的历史回忆，及“小莺”出国前后的个人际遇。以个体记忆的丰富和感性的叙事方式回望历史，“小外婆”等四代女人沧海桑田的故事，呈现出中国大时代、大历史的风雨烟云和中国伦理、情感的回归。“两位作者，利用自身的家史和经历，以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真实家史为见证手段，从一个社会细胞家庭、家族的演变史里揭示启人深思的人生问题。”——著名评论家陈思和如此评价。

希特勒与德国人

◎ 陈增爵

量。就这样，该书分析了希特勒深思熟虑的策略、希特勒得以确立自己独裁地位的手段、希特勒散发其生存权力的“气场”、希特勒那理智和精神相割裂的生命力、希特勒的女性观及女人缘。

《希特勒与德国人》是沃格林1964年慕尼黑黑大系列讲座的讲稿，由此对希特勒这么个已经“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进行考证式阐述，并非卖弄学识。该书企求剖析希特勒张狂的那个时空，是德国无数个人，乃至整个民族由此都生活在悲剧命运的层面。那是一个充斥着精神堕落的历史层面。他要求用整合记忆的能力，清算那随着岁月积淀，会逐渐沉入遗忘之中的历史。他拒绝某些人用“糊涂”作为搪塞、推诿，因为“糊涂有诚实的糊涂和高明的糊涂。”“糊涂是全然灵活的，能够穿上真理的所有衣裳。”可以说他用宗教意义上灵魂的转向、皈依和赎罪的观念，考量那所谓“糊涂”的内涵。挖掘那些并非纳粹党徒，当年却依然做个守时的公务员的得体：他诚实地劳动一天，然后洗洗手，回家。如同集中营的纳粹分子将灭绝人性的作恶视为日常劳作一样，每天下班前洗手。他认为如果说后者是罪犯，那前者就

是同谋、帮凶。“希特勒掌权后解除一些不只是犹太人的教授的教职，可没被解雇的人，没有一个拒绝高高兴兴地去占有被解雇者空出来的位置。”他质问那些填位置者的良知何在。挖掘当年这些“糊涂”往事，从微观角度切入，是对人性本能领域那个“黑箱”之探索：从宏观角度观照，则是对那个时代德国民族精神迷失的盘点，如同对精神废墟的追述。沃格林这番纵横于伦理、宗教、哲学的挖掘，在文学领域获得了可喜的回应。那就是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沃格林声称《浮士德博士》是德国人对德国的伟大哀歌(该书前几年已由上海译文社出版中译本)。

书写历史可以有多种方式：纪念的历史、文物的历史、批判的历史……是否用全新的精神境界，对过去的时代作判断？必须“把那时代的事件置于精神审判之下”。沃格林的《希特勒与德国人》提出重新思考纳粹时代，质疑那些描述性历史的价值——因为人们想知道的不是那些血淋淋的细节，而是想知道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认为对失去了精神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唯有用批判的方式书写，才能使人们获得解脱，哪怕支付任



何代价。书中又简要评说德国文化的精英人物，在阐述马克斯·韦伯学说和生平介绍时，那用其形象的生活细节作点缀的文字，颇具文学色彩。极有意思的是，书中对韦伯的“激情”涵义所作的解释：“激情”即“灵魂驯养”——把灵魂笼络起来，让它集中到事实上。倘若按照这个涵义，“激情”就是具有理性之灵的思考。由此可以品味该书解释希特勒获民选上台的缘由：德国民众在“危机时刻面临失败时，他们会把自己的热情转向一个新的在人们看来很怪异的政权。”将此句中的“热情”与“激情”作个对照比较，或许，读者会由此领悟作者咬文嚼字的一番苦心。特别是《我的奋斗》在西方又印制面世的今天。